

清史論叢

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 编

貳零壹貳年號

12 年號



YZLI0890122324

清史論叢

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 编

貳零壹貳年号

12 年號



YZLI0890122324

中国  广播电视出版社
CHINA RADIO & TELEVISION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清史论丛. 2012 年号/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
清史研究室编. —北京: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, 2011. 12
ISBN 978-7-5043-6535-4

I. ①清… II. ①中… III. ①中国历史—清代—文集
IV. ①K249.07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231465 号

清史论丛 (2012 年号)

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 编

责任编辑 刘川民
封面设计 丁琳
责任校对 谭霞

出版发行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
电 话 010-86093580 010-86093583
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真武庙二条 9 号
邮 编 100045
网 址 www.crtip.com.cn
电子信箱 crt8@sina.com

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印 刷 涿州市京南印刷厂

开 本 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/16
字 数 390 (千) 字
印 张 21
版 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 2000 册

书 号 ISBN 978-7-5043-6535-4
定 价 48.00 元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《清史论丛》编委会

(以姓氏笔画为序)

王戎笙
杨 珍
李世愉
李华川
吴伯娅
陈祖武
张捷夫
何龄修
林存阳
高 翔
郭松义
赫治清

主 编 李世愉
副主编 李华川

目 录

读“争抢”柳敬亭文的感想和议论	何龄修 (1)
被译介的“新清史”	
——以“族”为中心的讨论	定宜庄 胡鸿保 (12)
确立统治与形成秩序：清顺治康熙时期对南方土司的处置	常建华 (23)
从《吴兴大事记》看顺治丁酉顺天科场案	[美国] 白亚仁 (63)
康熙五十九年乌兰呼济尔之战浅探	张 建 (74)
地方史视角下的福建翁山洪氏的宗教变迁, 1488—1752	
..... [新加坡] 庄兴亮 杨 希 (85)	
清代太庙祭祀及其政治象征仪式	王秀玲 (101)
明清京杭运河税关管理中的贪污、包揽与走私	黑广菊 (121)
清代射箭与“弓力”问题	毛宪民 (144)
嘉庆朝官员革职特点研究	许 静 赵 亮 (154)
晚清地方候补官委署过程中的规则与“潜规则”	
——以山西为个案	王 丽 (166)
满族的历史文化名人——达海	佟永功 (174)
陈昂父子与《海国闻见录》	吴伯娅 (183)

清代基层社会对礼的诉求及践履	林存阳 (195)
戴震礼学思想及其学术史意义	徐道彬 (206)
吴之英之《仪礼》礼图研究探析	邓声国 (221)
徐光启与阮元科技思想之比较	钟玉发 (231)
同心松柏非吾愿 茆屋藤床藐姑仙	
——明末清初才女王微的婚恋观念及意义	宋清秀 (249)
天一阁藏黄宗羲《明文案》再探	谷 敏 (260)
卢见曾、纪昀与两淮盐引案	曹江红 (269)
《乾隆休宁黄氏〈家用收支账〉》中所见清中叶徽州民间礼俗	李 娜 (275)
道光九年四华人旅法事考	李声凤 (283)
晚清时期中国和秘鲁建交过程初探	王士皓 (295)
清代西藏亚东关署理税务司张玉堂事辑	梁俊艳 (317)

读“争抢”柳敬亭文的感想和议论

何龄修

朋友从网上下载几篇文章,^①都是关于说书艺人柳敬亭的。他知道我对柳敬亭的历史很感兴趣,也略知一二,就把这些文章送给我。我认真读了一遍,发现这些文章持着同一观点,即认为柳敬亭是泰州人,可称为持泰州说者。另有一些人认为他是通州人,可称为持通州说者。两说的分歧由来久矣,不是新冒出来的。我也涌起一些想法,不妨在此说说。浅薄可笑之见,就算献丑,并向持泰州说诸位先生求教吧!

一、敬亭是泰州人

泰州地灵,孕育出柳敬亭人杰。柳敬亭与泰州的关系有如此者。但柳敬亭不止属于泰州,他是全中国的。他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伟人。他的辉煌的一生,他的卓越的说书艺术成就,不止是泰州人的骄傲,更是全中国人的骄傲。这才与柳敬亭这个名字相称。不要把他据为己有,甚至人家研究柳敬亭的祖籍都要质疑(不是质疑人家搞错了,而是指责人家在“泰州之外”再“安上”一个祖籍就是多事)。其实明人籍与贯是分开的(例如柳敬亭的朋友马进宝是辽东籍、山西隰州人,龚鼎孳是庐州府合肥籍、江西临川人等),人们的籍贯分属两地不足为奇。柳敬亭也是明人,有人探讨他的祖籍,实不为过。检查他的探讨是否正确,是应该的,不满意人家探讨就不很妥当。其实柳敬亭在泰州只生活了十七八年(一说为十五年),就带着泰州赋予他的灵气,闯荡江湖,才发展成熟。他在南京生活的时间比在泰州长得多,达四十余年。南京有资格“争抢”此名人,可以将他命名为“南京寓客、泰州人柳敬亭”。当然,我很讨厌这种“争抢”,没有丝毫鼓动南京出面争抢的意思,我只是想说明一个人成长为名人、伟人,其过程复杂多样,我们最好是以他属于全中国为出发点,认真研究他的历史。这样,心胸、眼界

^① 计有周志陶《评话宗师柳敬亭》、沙黑《漫言柳敬亭之“祖籍”》等数篇,可于网上检得。凡引文出自诸篇者,只加引号,不注出处。

可能更加开阔，研究成果可能更加准确、良好。柳敬亭作为泰州人，是有大量历史记载作为依据的。谁也别想抢走，也是抢不走的。

二、通州说者与泰州说者争抢柳敬亭的过程中，重要的关键是有——一部《通州曹氏族谱》“横空出世”，这才引出柳敬亭原名和祖籍等问题

因为这一族谱是通州说者唯一像样的根据，于是双方交火便以《通州曹氏族谱》为阵地。这部族谱我没有见过，不好说三道四。我只从学者的引文中知道一点儿，知识不够，也说不出一个子丑寅卯来，自然没有表态的资格。但是，我知道它不是近三四十年来争抢名人的白刃战中抛出的最新武器，它最初还是以学术资料的面貌出现在学人面前的。泰州说者对它应取郑重态度，才有可能把它打败。中国人有认名古人为祖先的习俗，比如，柳的同时人沈宜就曾认为柳敬亭是曹操的后代，“敬亭魏武之苗裔”，但是柳敬亭一点也不尊重这个“血统”，“翻然改姓不少忸”^①，我看沈宜也不过凑热闹捧捧场，随意说说罢了。但是如有人要“认真”拿沈宜的话做根据，当事者也不能不对，摆事实，讲道理。朋友送我的这几篇泰州说者的文章中，只有周志陶先生的一句“避而不言曹永昌就是柳敬亭的依据是不行的”，是强有力的打击。如果原谱没有就此点作出交代，引用族谱者又没有找到族谱外的证据，也就是说在曹永昌与柳敬亭之间没有建立起联系的情况下，就贸然宣称这两个名字是指同一个人，这是站不住脚的，在考证上缺少最坚实的一环，可以说是致命伤。至于说无人记载柳又名曹永昌、柳是宋朝曹彬之后等几点，都还可以解释。因为这些事情都要柳自己说出来，别人才知道，才可能有人记录。可是很少有人唠唠叨叨愿意把自己的谱名告诉别人。我们上年纪的男子大都有谱名，我们却不知道人家的谱名，只知道人们通行的姓名，或者还知道他的外号。柳敬亭离家时很年轻，我猜想他连自己都不知道他们是曹彬的后代（假设真是曹彬后代的话），他当然没法跟别人说。对待学术问题，人们有不同的态度，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者固多，坚持错误、不顾真相、意气用事者也不罕见。《通州曹氏族谱》至今仍有不少人相信或观望，是因为还无人揭破它的谬误。如果工作做到不限于将它的军（当然将它的军也很必要），而是更积极一点，对此谱的真实性作出可信的鉴定、论证，就此谱与柳敬亭毫无关系作出可靠的很“铁”的说明，将是研究柳敬亭的一个有力的推进，至少可以说说服许多持科学态度的人。泰州说就完全树立起来了。

^① 沈宜：《竹云堂稿》，《诗》卷2，《画柳歌》。

三、中华民族有尊重对国家、民族、社会作过巨大贡献的人物的传统。但是，现在火热的名人“争抢”战，却不好说是这个传统的一部分，所以才有争抢西门庆之类的荒唐现象掺杂其中

这里有一个出发点的问题，即为什么这样做？发展经济并没有错，但发展文化、经济应并行不悖，提高民众的文化素质和生活水平都很重要。有不正当的出发点和动机，必然不择手段，以求一逞。因而这里又有一个方法问题，即怎么做？歪曲史料，强辞夺理，弄虚作假，造假遗迹、假文物等，都是有人使用过的方法。这是嘲弄和捣乱历史，很不道德的行为，必须坚决反对。正确的做法是保护好名人的遗迹、遗物，进行展览、宣传，集中精力研究名人的生平、精神、成就，进行介绍、宣传，教育、激励世人和后人。这就是应该做的正确的事情。柳敬亭得到过乡亲的尊重和热爱，泰州人邓汉仪、宫伟鏐、沈默、夏荃等都热情洋溢地记录和歌颂过他。清末，泰州人徐丰曾写诗道：“早年生计大逶迤，指柳为名过水陂。舌鼓笙簧惊宿将，心存义侠暂栖枝。《春灯》《燕子》功徒用，野史稗官性可移。莫以笑谈称术士，于今父老尚低垂。”^①到清末，柳敬亭辞世已两百多年了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泰州父老始终有人沉痛地怀念他，还策划根据有限的记载为他画像。很显然，泰州的先贤创立了很好的纪念乡里名人的传统，使后人有所遵循。这也是泰州人民拥有的一份珍贵的历史遗产，后人应该总结、学习、继承、实行。当然，柳敬亭的里邻及其后辈不都是一样的，也有些人把他淡忘了，不仅他的遗迹、遗物消失得无影无踪，而且他的故居何在都不清楚。二百多年沧海桑田，是多么惊人的变化！倘若现今有人要去泰州凭吊柳敬亭，恐怕没有任何与他沾边的东西可看，这不能不令人浩叹！

四、我强调集中精力研究柳敬亭，是因为柳敬亭的生平和成就至今仍有许多不清楚的地方，迷迷糊糊，云遮雾罩，歧见迭出，错误丛积

如果我们在介绍和宣传柳敬亭时，忍心让错误包裹着他，让谬种流传，那我们就太

^① 徐丰曾：《东海散人诗稿（双桐书屋诗钞）》二集，《海陵怀古（用杜工部秋兴八首原韵）》（之八），《柳敬亭》。柳敬亭“指柳为姓”，不知为何被徐丰曾改为“指柳为名”？殊不可解。

对不起古人了。现在我试列出需要研究的有关柳敬亭问题的单子，并分述于后。这类研究，外地人做得不少，取得明显的成绩，他们大多不抢柳敬亭，研究起来没有这方面的思想负担和障碍。这就容易出成果。外地人热心研究柳敬亭，正是柳敬亭属于全中国的理由之一。比较起来，泰州本地人有先天的优势，但他们的潜力和优势还没有充分发掘出来，利用起来，这是很可惜的。我不能劝告任何一位先生不去参加争抢名人，但如果写作“争抢”文章，而不能推进研究，解决至少一二个柳敬亭生平或成就的疑难问题，则真是令人扼腕。

五、柳敬亭的名字和籍贯

柳敬亭其人的姓名，只有三点无争论，即柳敬亭三字无争论，本姓曹改姓柳无争论，外号柳麻子无争论。其余或说名逢春，或作遇春，又说字敬亭，也有的作号敬亭，引起激烈反对的是名永昌、字葵字。连老先生的名字都被搅得如同一团乱丝，扯不清楚，我看真有点对不起古人。柳敬亭不是出身缙绅家庭，也不是书香门第，一个穷人家顽皮无赖的小青年，名字不该如此复杂。名、字、号齐全，是很出人意料，不大合乎情理。这个问题应列入柳敬亭研究中最紧迫、最严重的问题处理。

籍贯问题同样要探讨清楚。人口的流动，是社会生活中不可避免的现象。虽然，封建社会是相对停滞、相对凝固的社会，封建统治者又力图把人口束缚住，把他们固定在其居住的地方，以保证稳定可靠的税源和役源，为此采取各种制度化的、非制度的、暴力的、和平的手段，但束缚人口的目的仍然达不到。社会的（不堪忍受的压迫和剥削、丧失土地财富、饥饿、战乱不宁、政府强制等）、自然的（天灾、大疫等）原因，总是促进人口流动。所以人们大都有祖籍。尤其是明朝，把籍与贯分开，分立民籍、军籍、商籍、匠籍、灶（煮盐）籍、乐（妓女）籍等，世代相传，加以束缚，以保证当兵、干活、玩乐都有人承应，而贯则留给人口流动。比较起来，封建统治者非常重视籍，而民众则幸另设有贯，使流动、迁徙不致完全非法。如果柳敬亭没有祖籍，从他的祖先，从曹家一世祖、从曹家的根起，就是泰州人，那当然应该作有说服力的说明；如果有祖籍，则应指明祖籍何地，能够说明始迁祖何人，传承次序如何就更好，但不管说什么，都要有根有据，做充分的论证。不能信口开河，胡诌瞎说。那不是科学态度。

六、生 卒

探索古人的生卒年，是要了解古人生活的时代。知道古人生活的时代，就可以研究

时代怎样哺育了这个人物，而他又怎样回报了这个时代，他做的一切有什么适合时代的需要，什么不适合。这是从大的方面说的，还有其他许多需要借助生卒年解决问题之处，如某些考证等。关于柳敬亭的生年，传统上一直依据阎尔梅一首七言古诗的题注，确定为万历十五年（1587）。万历十五年说的始创者不知是谁，可能是说书史著名专家陈汝衡老先生（已故）。此说一统天下半个世纪左右，从无异议。但到1983年，局面有所改观。我试作一文，提出新说，向传统说法挑战。我的新说即万历二十年（1592）说，指出阎尔梅诗题注是一个孤证，引用许多材料论证柳敬亭生于万历二十年。万历十五年说只是根据题注推算出来的，没有论述，没有旁证（这就是新说所谓孤证）。如果没有根据充分的新说问世，就让旧说存在，也没有人说闲话。有了新说，旧说的日子就难过多：旧说的拥护者、坚持者理应站出来论证旧说的真理性，最好还能找到新式武器，把新说打垮，战而胜之，重建旧说的权威。不能装聋作哑，不出大气不放声，而仍然沿袭被人指责为错误的旧说，这不是认真的治学者应有的态度。我看几篇泰州说者的文章，都拥护旧说，仿佛新说没有过。不仅如此，这些文章不仅把柳敬亭的生年提前，而且把他的卒年延后，声称他活到90岁，这不是事实。柳敬亭晚年生活艰难，他没有受那么多年折磨，他早几年就驾鹤西归了，这是有材料的，不是默默无闻的死去。他热情待人一辈子，不会没有人关注他的命运。热爱柳敬亭的人，应该更郑重地对待他的生平，尤其是他的生卒。举行周年纪念也能符合实际。

卒年的重要性与生年差不多。生卒年都清楚，才知道享年几何。柳敬亭的卒年更是一笔糊涂账。许多人不去追究（我只说许多人，肯定另有不少人追究了而不得结果，我不能一锅煮，埋没他们辛勤的付出）。这里有文章干脆说他卒于何时“却未曾留下一点迹象”。明清文献浩如烟海，“未曾留下一点迹象”这句话可不是能轻易说的，如果翻寻过而没有得到，只能说我没有发现，如果连这一步工夫都不曾下，就只能说我缺乏研究，这是实事求是的。找资料也是一种披沙拣金的磨人活，尤其是特定的资料，更如海底捞针，着急不得。努力，努力，多少会有收获。

七、青少年时事

这里的青少年时，是指柳敬亭说书成名以前的年代。柳敬亭的青少年时代不类常人，复杂、多彩。有些事没有不同记载，因此没有争论。比如他天涯放游并在途中改姓，他拜莫后光为师学习说书艺术等，学术界意见基本上一致。也有许多事有歧见，比如他离家出游究竟是何原因，出走时有多大年纪（十五岁，还是十七八岁。有一篇文章使出高招，用“十六岁左右”把年十五和十七八“统一”起来了，但这种统一是多

此一举，十五和十七八很具体，在那个年龄段相差二三岁，其成熟程度很不一样，外部表现也大不相同，改成十六岁左右，反而把事情搅浑了），投师学艺是何年，学成后成名前的经历有哪些等。这些事虽然不是十分重要，但弄成一笔糊涂账终归令人扫兴。有一篇文章说，柳敬亭学成前曾经下乡演出，“只是在乡野村镇之间随意而行”。这可是个有重大意义的新闻。过去我们只知道他在盱眙市上说书，能倾其市人，不知道他还下过乡，估计也会倾其村人。唯一让我不解的是，文章作者为什么不交代资料来源。我开始感到有点不安，深怕是想当然的产物，让我空欢喜一场。

八、对清朝的态度

一个人的爱国精神、民族精神，是由这个人世代生活其上的祖国大地哺育起来的，是共同的语言、悠久的历史、紧密相连的血肉联系、统一的心理状态等多种因素培植出来的。不是心血来潮的产物，也不是一时的私利决定的。柳敬亭的政治态度，主要是对明清易代的态度，是一个难题。因为这在当时是个敏感的话题，有所言、有所行，都要瞻前顾后，加倍小心，稍有不慎，就可能引火烧身，破家杀头。记载更不行，白纸黑字，铁证如山，逃不脱血腥的惩处和镇压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一个必然的结果，就是如果柳敬亭秘密反清，肯定很难找到记录其情况的文献资料。大家已注意到柳敬亭坚持穿戴明朝衣冠，并且说他声称这是说书表演古人的需要，不过我还没有见到有关的记载。另外傅抱石所著《民族艺人传》，传著列入大批明末清初文人，或与民族无关，或与艺人无缘，而竟没有楚两生或其中任何一人。可见找出表示他们的民族立场资料之难。从目前掌握的情况看，还只能就已知史实做分析、推论，分析、推论乃至索隐，是一些研究的方法，只要前提正确，逻辑运用得当，也可以获得可信赖的结论。此外，我们还可以采取存疑待考的态度，以昭郑重。这不是什么猜测，史学不是游戏，没有猜哑谜的余地。陈寅恪《柳如是别传》常用此类方法进行研究，史实层面的挖掘之深，浅薄的研究者无法望其项背。理论升华尤其需要分析和推论这些方法的熟练运用。好好读读前辈学者《柳如是别传》一类的著作，可以使研究方法多样化、科学化，也可以避免犯轻嘴薄舌的错误。态度端正，认识正确，才能进入研究程序，才有可能出成果。

这里有现成的问题：柳敬亭曾多次离开江南去外地，他究竟干什么去了？这个问题必须弄个水落石出，对于破解柳敬亭政治面貌难题，可能有大的帮助，现在单挑他去浙江的问题说说。柳敬亭去浙江是顺治十三年冬的事，在浙江差不多停留近一年。他在浙江穿梭奔忙于绍兴、鄞县、萧山、崇德等地，在这些地方说书都有诗篇纪事，表面看来合情合理，实际上，一个年近古稀的老人，为了说书，值得在外省呆上近一年吗？家人

能放心吗?这些都是不可理解的疑问。读陈寅恪《柳如是别传》,恍然大悟。原来沿海火热的抗清战争,浙江由张名振、张煌言领导,福建由郑成功领导,正轰轰烈烈进行。顺治十二年(1655)曾三次进到长江,声威大震,人民仰望,如大旱之望云霓,形势比较有利。这些反清武装的领导人看到这些情况,派密使到陆上联络,要求积极配合,闽、浙海上武装联合于永历十二年(即顺治十六年,1659)攻取南京。《柳如是别传》指出,当时闽、浙沿海士绅深感振奋,暗中聚会、联络,摩拳擦掌,准备一搏。鉴于柳敬亭与明朝士绅久远而深刻的历史关系,他可能也参加到反清的行列中了。他到马进宝(逢知)幕下,很有可能是众人,或钱谦益、郑成功的主意,让他去策反马进宝,解除守卫南京的一部分武装(清军绿营兵),把他们改变为翻转身将刀向江宁将军率领的八旗兵砍去的力量。钱谦益本人也策反马进宝,多次赴马处活动。马进宝其人凶残、奸猾、诡诈、无赖,钱谦益冒险去做策反工作,马进宝一旦翻脸,钱谦益就成了俎上鱼刀下肉。有柳敬亭在其幕下,钱谦益的人身安全系数就有较多保证。

清朝开国君主顺治皇帝,是一位热衷于学习其他民族文化,乃至西方天主教文化,力图提高本民族文化素质的英明君主。他喜爱汉族文化,甚至把汉族民间文艺如说书人召入宫廷供奉。陕西说书名家韩修龄是当时广为人知的御前说书供奉。文人赠送诗词给他,差不多都要突出此点,以为韩生的荣光。王士禄就在赠诗题注中写道:“善平话,尝供奉世祖皇帝。”^①冒襄作为明遗民,不愿明标清朝某某皇帝,也不忘记加一句:“近侍皇恩旧。”^②这些都是明显的例子。有朋友曾经问我:柳敬亭说书名气大大超过韩修龄,为什么没有被召进紫禁城上几回班去?我想,此点正与柳敬亭对清朝的态度不能没有关系。他结交清方人士还是有选择的,较愿接近那些怀异见、动摇心理、离心力、两面态度的人士,对死心塌地的降清分子不感兴趣。因此,他总是以个人身份接触他们,接受他们救济,不请求建立官方关系,领取薪俸。在这种情况下,如果清廷对他下征召诏,我猜想他会逃亡、拒绝。

必须强调一下,对清朝的态度问题十分重要。明清易代是一场极其激烈的斗争,它与民族斗争结合起来后,不仅激烈程度飙升,而且斗争性质也发生明显变化:清朝统治者否认自己是明朝臣民,把“大清”与中国、与明朝对立起来,酿成野蛮的征服战争。因此,明清易代对每个中国人都是一场考验。我们有责任把柳敬亭在这方面的表现研究清楚,大力清除遮蔽他的真相的迷雾,让他的爱国民族艺人的光辉形象巍然屹立。我通过分析、推论,坚信他具有炽热的爱国情愫和民族精神,但分析、推理获得的结论,理应有史料证实,才能令人信服。找不到材料,可能只说明我们的工夫没有下足,研究有

① 王士禄:《考功集选》卷4,《赠韩生二首》。

② 冒襄:《巢民诗集》卷3,《五言律诗》,《己酉》。

差距。我主张少打些笔墨官司，多做点脚踏实地的工作，以期无负我们祖先中的伟人、名人。

九、与阮大铖的关系

一种私人关系似乎是个小问题，小事一桩。但要与谁的关系，凡事具体分析，不可一概而论。孔尚任的《桃花扇》是有意义的好戏，但也给历史添了乱。由于他在戏中虚构了许多情节，而又信誓旦旦地保证他说的事都有根据，这就蒙蔽了许多人，对他在戏中的捏造都信以为真。学者是有判断力的人群，壮年以上的学者更应是如此，“四十而不惑”嘛。令人深感惊异的是，在孔尚任的虚构面前，他们的判断力似乎都烟消云散了。比如孔尚任说，李香君的昆曲教师周如松就是昆曲清唱名家苏昆生。李香君从周如松学戏，可是她热恋的对象侯方域说的，侯方域为什么不说不周如松就是自己的同乡苏昆生？苏昆生自在历史舞台上亮相以后，通行的姓名就只有此苏昆生三字，没有其他，为什么应聘给李香君说戏时忽然改名换姓，而且改名换姓后只用此一次，以后仍恢复使用苏昆生这一姓名？这都是解释不通的。明明是孔尚任在文艺创作中稍加点缀，增加趣味，我们的著作或著作注释无一例外将其奉为信史。这真令人哭笑不得。

关于柳敬亭与阮大铖的关系，也是孔尚任随手点染、炒作的事项之一。阮大铖是在士绅（官员、士人、地方头面人物）中出了名的坏蛋。他干坏事是从天启年间魏忠贤最猖狂时就开始的，是公开的，不是偷偷摸摸的。魏忠贤垮台后，他名列逆案，削职赋闲。这样一个臭名昭著的坏蛋，士绅中何人不知，何人不晓？柳敬亭成名后就与士绅结交，时间已有十余年之久，何至要到崇祯十一年《南都防乱公揭》出来时，他才如梦初醒：“原来阮大铖不是个好人呀！”岂不可笑？孔尚任之外，没有人说过柳敬亭曾做阮大铖门客，没有人这样描述柳阮关系，只有吴伟业说阮大铖于柳敬亭为故人。这就是说，他们相识已久，但来往并不密切，阮大铖的诗文集里不见柳敬亭的踪影，而名净彭天锡的名字至少五次出现在阮大铖诗题里，南曲清唱家李澹生、歌伎顾媚（后嫁为龚鼎孳妾）、名画像师曾鲸、家班艺人奏技或其他活动，他都曾赋诗记录、赞美。鉴于阮大铖是一个著名的戏曲爱好者和戏曲作家，柳敬亭在他那里居然没有一字反映，这不是没有意义的。这说明他俩虽是老相识，柳敬亭对他心存厌恶和戒备，保持距离，可能都没有在阮家表演过评话（否则阮的诗集里会留下至少一首题为《听柳敬亭演说水浒传故事》之类的诗词，阮大铖的诗在明末是高水平的，由于削职闲住，他正闲得发慌，只好把精力都用在文艺创作和演出里）。这个问题还应该深入研究，我只提出来而已。涉及柳敬亭的问题很多，我们不见得对每个问题都很熟悉，这不要紧。重要的是，一要

不断扩展自己的研究,不要稍有所获就止步不前;二要勤于思考,提高学术是非判断力,不要跟风。学识是积累起来的,正确的知识积累多了,心里就亮堂了。

十、艺术成就

柳敬亭的艺术成就,是他成为历史名人,几个地方争抢,人们至今还研究他、纪念他的根本原因,或根本原因之一。但是,许多研究只知道说他是说书业的祖师爷,或最关注他是否扬州评话的创始者,至于他的成就在几个方面,好在何处,就说不很具体。其实比较起来,柳敬亭的说书是怎样进行的,其具体过程的描述,高潮的掀起,听众的反映,在古代说书艺人中,资料是最多的。关键在我们的研究没有跟上,搜集、爬梳、考证、分析、概括都不够。如果柳敬亭的艺术成就说不明白,那么为什么把他奉为名人,纪念他,就缺乏落脚处了。根据我的粗浅的知识,有关他的艺术的史料,应该到赠送他的诗词中去寻找,记录、描写他表演情况的诗。作者多采用七古,字数较多,可以尽兴发挥,因此大都写得活灵活现,生动感人。从中所见整体评价,细节描写,都很到位。如能慧眼识珠,搜集比较充分的资料,整理、排比,就可以概括他的艺术成就的若干方面,这将对柳敬亭研究的一大推进。这双慧眼至今很难得,令人深感遗憾,甚至难过。

十一、关键年代

年代问题很重要,确定清晰、正确的年代及其顺序,对研究人物的生平有重大意义,有利于分析人物的思想发展、变化,有利于划分人物生平的阶段,有利于认识其人与社会的联系,等等。人物研究必须用很多时间考证、确定其生卒和其他关键年代,原因就在于此。柳敬亭有何重要年代需要下工夫研究呢?

艺术表演成名的年代。柳敬亭成名前后颇有不同表现。成名前他多在书场、茶馆公开表演,顾客多为市民社会中、下层人物,甚至劳动者;成名后逐渐转向堂会表演,固定价格,必须预约,并收定金,顾客转为有钱人家。这种转变是比较明显的。据沈默简单、明确的追记,当柳敬亭拟在扬州举行义演,以救济已故主人之子时,先广贴赫蹄云:“柳麻子又来说书。”^①妙在“又来”二字说明他脱离公开营业演出已有些时日了。

^① 沈默:《发幽录》。

柳成名前后另一变化，是他成名后开始广泛结交士绅名人而进入上流社会。这两种变化，都反映出他逐渐疏远人民的消极一面。因此，柳成名年代的探求，可以知道这些变化发生时间的起点。这个问题过去很少有人注意。

在江南以外地方活动的年代。这是整个柳敬亭研究最薄弱的一环，然而也是很重要的一环。有线索的是山东、浙江、江西，情况比较清楚的是北京。主要的问题是缺少材料，这是政治的影响。比如山东，他到山东几次？各在何年何月？见过什么人？有何活动？还没有见到可信的记载。据有人说，根据网上材料，柳敬亭曾在济宁说书，民间尚有此说法。但没有见到记载，再说活动内容也太简单，年月也缺，没有多大史料价值。

柳敬亭初到京师的年代。这个问题重要而有趣，因为它牵涉柳敬亭对清朝的看法和态度。目前有关柳初到京师的年代，占统治地位的是康熙元年（1662）说，根据的是《漫游纪略》讲述的，漕运总督蔡士英乘船沿运河北上京师，途中有柳随舟奏技的记载。蔡士英仲夏抵都门，但对柳的动静无一字交代。人们相信他跟到了北京，似乎再补充证明，就是画蛇添足，纯属多余。但是此行路程遥远，时间因大多为逆水而稽迟，在这个过程中什么事都可以发生。途中情况的记录不能证明抵达目的地的事情。这应该是考据的常识，也是情理的常识。可是许多文章坚信这段记载可以管到北京。有的文章还活灵活现地说，柳的到来在北京文坛引起了很大的震动，他周旋于京师士大夫中间“首尾四年”。有资料证明吗？我敢说是两手空空。考察过在京师“欢迎”柳的人中那时有人不在北京吗？可是康熙元年至四年（1665）间汪懋麟、曹尔堪就不在北京。汪的诗是纪年分卷的。他的七古《柳敬亭说书行》就在康熙九年（1670）那一卷里，诗集还说明元年至四年他在扬州家中，五年晋京准备参加六年春的会试，是科得中进士。曹则在康熙登基之年即顺治十八年春，接受庆典中给官员两世先人追赠官职的恩典，但不久就因族子奏销案的连累，罢官回乡，朋友凑钱帮助抵赎，仅免流放关外，从此他旅游全国，只在康熙十年春曾一过京师。汪、曹的情况摸索过吗？有过想要弄清情况的愿望吗？看到柳康熙元年“进京”一事在当时诗文中丝毫没有反响吗？看到蔡士英抵京同时方拱乾在山东《遇柳敬亭》的五律二首了吗？难道柳敬亭得道成仙，掌握分身术，可以一面与方拱乾在山东畅谈，一面又随蔡士英抵达京城访朋友吗？了解龚鼎孳在康熙元年还没有完全脱离政治上滑坡的困境，没有那种愉快、闲适的心情，生出接待柳的主意来吗？知道康熙九年柳初到北京在文坛引发的真正的震动吗？这里左一个右一个的疑问，持康熙元年说的先生们，除非强词夺理，否则难以作答。可知柳初到京师年代为康熙元年说，碰到的不可逾越的障碍太多，它是以错误地扩大其作用和价值的史料为孤证，构成的镜花水月、空中楼阁。康熙元年说虽然荒谬，但仍有许多的笃信者。其实20世纪80年代初我在《与陈汝衡先生商榷》柳敬亭问题的小文中，已提出柳初到京师

年代的新说,这个新说即康熙九年说。这是对康熙元年说的严肃挑战。旧传统有其强大的习惯势力和堕性。据我所知,大多数研究者仍信奉旧说,学术界接受新说的不多。最不正常的是,康熙元年说是依据某一特定记载推测出来的,前提(柳在行舟北上途中曾演说评话)与结果(柳也同蔡士英一道抵达都门)之间,并没有必然的联系,不像新说是从旧说的包围中冲杀出的,需要打倒旧说,论证新说的正确,树立自身的权威。在没有新说挑战的情况下,作为推测依据的史料被视为唯一正确的记载,这样推测也就轻松地过了关。现在有了新说,就不能装聋作哑,必须起而反击,维护旧说的“真理”性,揭发新说的错误,将新说击溃才行。现在一些坚持旧说的作者,既不作仍然沿袭旧说的科学解释,也不站出来批判和推倒新说,只是自说自话,是为什么?一件比较简单的事都不能搞清楚,把柳的生平弄乱,使谬误流行,是很不妥当的。有的研究者在柳生平许多问题尚不清楚的情况下就为柳编《年谱》,似乎性子太急了些。那样的《年谱》编出来,恐怕难免缺胳膊少腿,错误充斥,不大可靠。目前最好还是进行专题研究,把一些问题,就如柳初访京师究竟为何年等,探讨清楚,为编撰质量上乘的《柳敬亭年谱》准备坚实的基础。编年谱是个水到渠成的事情,资料搜集齐全了,做了整理加工,有关的问题都想到了,研究获得了正确的结果,《年谱》的编成,不是倚马可待的事情吗?

柳敬亭活到高龄,艰苦备尝,危险数历,也有过响亮声名,风光岁月,接触的人东西南北上上下下各种各样,因而发生可记的事情显然不少,没有揭出的、弄不明白的问题自然也多,择其较重要者列举出来,以见柳敬亭研究的方向应指向何处。一孔之见,虽然浅薄,但是认真,供采择或批判。